

冀凡楚辭研究文集

顏新宇題

冀凡楚辞研究文集

水沫文学社

冀凡楚辞研究文集

冀凡 著

中国·湖北·黄石沈下路 49-1 号

邮编: 435002 电话: 0714-6220329

890×1240 1/32 开本 10 印张 254 千字

黄石港区印刷厂 承印

2004 年 5 月 18 日印刷 印数 1-500

(2004)鄂石内图字第 016 号

作者简介

冀凡，湖北黄石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员，湖北屈原研究会名誉理事，湖北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员，湖南东方名人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楚史、楚辞研究，著有书稿《〈九章〉新释》、《〈九辨〉新释》，撰写、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作品多为《世界学术文库》、《中国精典文库》、《中国当代专家论文精选》等《文集》、《文库》收录，并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优秀论文等多种奖项，其传略则入编于《世界名人录》、《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典籍中。

知忠解译，王著之微一

正确解读《惜往日》的锁钥

蔡凡

在原《九章》中的《惜往日》，向被一些学者称作屈原的“绝命辞”，以释其文。是耶，非耶？余早曾著文答复：“《九章》没有‘绝命辞’。”^{〔1〕}本文之意，在于通过对一些关键词语解译，解误屈辞之义，以明屈原作辞之旨。

一、掌握解译《惜往日》的锁钥

《惜往日》之文并不深奥隐曲，叙述的层次清晰，亦不错综复杂，然由要真正把握其要，释明其意，明其主旨，却不那么容易。否则就不会是到“绝命辞”的耶路之云。破解之钥，意蕴有三：

其一，明其形势。屈原作辞，是有其创作背景的。故需明其形势，亦即作辞的历史背景。《惜往日》篇是思美人之次，是含有深义的：思美人，既是在咏南人反秦的篇章，则《惜往日》之所叙所论，必与南人反秦的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南人反秦之役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以特其策到者受屈致其职，遂干朝，于是江南，以待步

17011284.22 5

20x20=400

第 1 页共 5 页

作者手稿

目 录

自序	1
屈原是效“彭咸水死”而自沉汨罗的吗?	7
论楚怀王、顷襄王之世“合纵”与“连横”两种策略的斗争 ...	20
《招魂》，招顷襄王说	35
论秦拔楚郢之战	45
《九章》总体研究系列	
《九章》的完整性未可置疑	57
《九章》与秦拔楚郢之战	68
《九章》与屈原在江南的行踪	79
《九章》与屈原之迁放	88
《九章》与屈原之自沉	97
《九章》没有“绝命辞”	108
从《九章》探察屈原在汨罗	115
《九章》单篇研究系列	
惜诵——《九章》的“叙言”	123
屈原为何去溁浦	130
郢之不复，《哀郢》之魂	137
屈原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抽思》新解	144
《怀沙》之“沙”与沙市之“沙”	151
《思美人》与南人反秦	159

知忠辨谗,王者之鉴——正确解读《惜往日》的锁钥	167
《橘颂》——南人反秦精神的颂歌	175
南人反秦后的形势与《悲回风》	182
从《九章》窥探《离骚》的创作年代与历史背景	190
湖南楚墓·巫、黔之役与《九章》、《九歌》	199
屈原何以作《九歌》	205
“四凶”、三苗与《天问》	217
屈原的本事、原型及其流变	226
彭、咸与屈原	239
宋玉《九辨》中的屈原形象	246
《楚辞》成书探源系列	
谁是《楚辞》最初的编纂者?	255
屈辞、《楚辞》的传播与刘安之续纂	262
校辑《楚辞》,集其大成之刘向	269
屈原为何要自沉?	275
屈原果真被“放逐汉北”?	283
以史论世,旧学新构	291
附录:	
放鹰台楚宫遗址贝壳路与屈原之《九歌》	296
入编各种《文集》、《文库》作品目录	298
后记	299

自序

屈原是我国古代、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活动家和伟大的诗人，是中国新的诗体——辞的创造者，他的作品被称作“屈辞”，与其他楚人的辞作一起，则称作“楚辞”，是中国古文化的瑰宝，也是长江之域楚文化的光辉代表，1954年被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他出生于公元前343年夏历正月21日，初仕于楚怀王，为三闾大夫，正值楚国由强趋弱之期，国内政治上的变法改革与因循守旧、国际上的合纵与连横的策略斗争极为激烈，屈原的修明政治、富民强国主张及合齐善韩魏的对外策略，屡遭谗人之嫉，故被楚怀王时疏时用，屡屡使齐修好。及怀王死秦，顷襄王继立，被任用为左徒，则依据君王的命令、文告阐明时势，承奉先王的功业照明群臣和下民，对稳定局势、安定民心以应强秦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顷襄王奉行妥协的亲秦之策，则使国势益弱，特别是19年秦发动伐楚战争以后，北线攻邓、取鄢、拔郢，南则连攻巫黔，逼楚弃郢东迁，徙都于陈，使楚陷于倾危之境。面对此势，屈原则主张开发江南，南渡入湘，施行反秦复郢、兴国救楚之策。并依据与君王“成言”，奔赴沅湘策划，于23年秋冬爆发了使世人震惊的楚复江南之役。由于楚王改变策略，背叛“成言”，中道“悔遁”，致郢都未复，仅收复江南15邑为郡，以拒秦。这一秦楚战争史上楚所取得的唯一胜利，却被楚王的妥协亲秦之策所售，落了个遣使谋平、与盟事秦的结局。屈原则被黜职，弃逐于江南。屈原被逐以后，江南人民的反秦事业横遭摧残与镇压。楚之国势益衰，面临着随时覆亡的危机。屈原满怀愤懑，发愤抒情，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五部不朽的传世之作，篇篇凝聚着他对楚国、楚王的忠贞，对奸邪谗人的愤慨和对国家命运深深的悲忧。36年，顷襄王病死，屈

原不忍与谗人黄歇当政的浊世共存，遂于公元前 262 年夏历 5 月自沉汨罗殉国，终年 82 岁。屈原死后，弟子宋玉，首编屈宋合集，内容为屈原之《离骚》与宋玉之《九辨》，名曰《楚辞》，此为《楚辞》传播之始。

我之研究楚辞，始于 1978 年，至今已整整 25 年。收于这个文集里的，是我 25 年来在楚辞这个古老的学术领域研读、探索中写下的 33 篇论文。其写作年代，始自 1982 年春至 2004 年初，历时 22 年。内容涉及屈原的五部作品及宋玉的《九辨》。论文包括三个系列，即《九章》总体研究系列、《九章》单篇研究系列及《楚辞》成书探源系列，共 19 篇，几占论文总数的 2 / 3。主要探讨的问题有：1、屈原为何要自沉？2、楚之盛衰与纵、横之策；3、顷襄王世的秦、楚战争；4、错综复杂的《九章》研究；5、屈辞传播的源头何在。下面我将围绕这些问题谈谈其探索的情形。

先谈第一个问题。前面讲我的写作始于 1982 年，此前的数年，我为屈原的五部作品作注，名曰《屈辞新释》，五卷约 20 万字，这是我探索起步的基础。这年 6 月，屈原学术讨论会将在秭归举行，对屈原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屈原为何要自沉？要解决它，迎面而来的问题是：屈原是否效“彭咸水死”而自沉？自从东汉王逸提出“彭咸水死”之说以来，统治了楚辞学界二千多年，正象游国恩先生所说：“屈子之效彭咸水死，二千年来无异辞。”果真无“异辞”吗？我的文章便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的，但在彭咸究系何人的问题上却有未妥。当时只是从楚族之源上考虑，认为彭铿乃楚之祖伯，考虑他对屈原影响力未必那么大而直接则不足。直到 2002 年作《彭、咸与屈原》、2003 年作《屈原为何要自沉》，问题才算比较圆满的解决。前后历时 21 年。

我的楚辞研究，是与楚史研究同步进行的。我认为，要研究楚辞，了解屈原及其作品，必须在楚史、楚文化的研究上狠下功夫，要历史的研究屈原其人，要在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研读其作品，才能有所新的突破与进展。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制度大变革、

大动荡的时代；他所生活的怀、襄时期，是楚国由强而弱而衰的重要转折。秦、楚两国，何以在强、弱之势，成、败之局上成逆向发展之势，除了变法图强成败的因素外，纵、横两策的抉择与运用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第二篇论文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楚怀王由于为二国姻亲关系所拘，动摇于纵、横二策之间，使国势由强而弱，战败、地削而身亡。顷襄王则一味妥协亲秦，苟安图逸，使国势益弱益衰，不战而溃，弃郢东迁，濒临覆亡，形成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屈原的前后期思想和政治主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是顷襄王之世的秦、楚战争。我将爆发于 19 年的秦伐楚，至 27 年楚质太子于秦这个时期发生的战争，统称为秦拔楚郢之战。这场绵延九年的战争，对楚国历史进程与发展，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楚史究不能不予以特殊的关注。我的第四篇论文，便是欲就这场战争试图作一轮廓性的探讨与论述。这场战争，实际上包括了三大战役，秦作为进攻一方，进行了北线的攻邓、灌鄢、拔郢之役，和南线的攻取巫黔之役。楚作为反击一方，则进行了楚复江南之役。这次战役，楚出动的兵力，单顷襄王就有 10 多万，尚不包括江南的兵力，估计不会少于 20 万。其战略目的是壮大江南反秦力量，一举收复巫黔及郢都。由于楚王改变策略，背叛“成言”，中道“悔遁”，没有达预期的目的，只于江南收复了 15 邑。尽管战果不大，却是秦楚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但楚王却讳之莫深。妥协亲秦之策，使它落了个遣使谋平、质太子于秦的可耻与可悲的结局。关于这一战役的记载，《楚世家》却将功劳归之于顷襄王，以伐其功。屈原《离骚》、《九章》、《九歌》、《招魂》虽有所反映，或过于隐蔽，或过于零碎，使人难于窥知。我的《湖南楚墓·巫黔之役与〈九章〉、〈九歌〉》，从考古的角度，将之联系，作了一些描述，或可有助于窥知其一斑。

下面再谈《九章》的研究。《九章》的研究，分“总体研究”与“单篇研究”二部份。为什么对《九章》要作总体方面的研究？因为

《九章》存在的问题最为纷歧和繁杂。每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会接触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九章》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抑或是九个互不联系的单篇凑合？也就是宋代朱熹说的“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的。朱氏“非必一时之言”的论断问世以后，固然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呈现了《九章》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其影响所及，造成的分歧和繁杂却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朱氏之论是否为一种科学的论断？我的《〈九章〉，的完整性未可置疑》，就是试图通过各方面详细的论证给予科学的答复。我的结论是：备为一说则可，若奉为不易之经典，则谬。《九章》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九章》与秦拔楚郢之战到底有无关系？这就是总体研究第二篇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其结论是：《九章》诸篇是个不可分割的、篇次不可颠乱的整体，它真实的反映了、并再现了秦拔楚郢之战历史。有了这样的结论，屈原在江南的行踪得以考定，《九章》与屈原之迁放、自沉、有无“绝命辞”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探讨所及，还正确的解决了《九章》与《离骚》这二部著作的关系：这二部作品为同一时期的前后之作，《九章》所言之“重著以自明”，“重著”便是指《离骚》而言；“明”者，明《离骚》之未明，言《离骚》之未言，为考定《离骚》的著作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九章》进行了总体研究以后，为什么还要作单篇研究？这是一方面是要将总体研究的结论应用于单篇研究，以检验其是否正确，同时又可用以指导单篇研究的工作。另一方面单篇研究又有其各自的独特任务，例如《惜诵》在《九章》中的作用，屈原为何去溁浦，《哀郢》的要旨何在，《抽思》与屈原是否放于汉北，《思美人》与南人反秦……等等。这里不仅牵涉到历史的考察，文字的训释，还要作通篇的思虑。要做到通篇的史、事、文、情皆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呵！

最后，再谈谈楚辞研究的源头何在的问题。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呢？在楚辞研究的实践中，常感到有个不成文的定则：一切须以汉代

人的载论出发。例如考定屈原的事迹和《离骚》、《九章》的著作年代，则须遵从司马迁《屈原列传》和王逸《离骚序》所构成的框架：即怀王怒疏屈原作《离骚》，顷襄王怒迁屈原作《九章》。这个框架果真可信而不易吗？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 93 年，他的《史记》也当在此前完成，他的《屈原列传》之作上距屈原自沉之前 262 年，至少也有 150 年。在这一个半世纪的空间里，屈原的事迹及作品是怎样传播开来的，他能知其详吗？再说，《离骚序》果真是王逸所撰吗？否则，那末它又是谁最初所撰，谁又是《楚辞》最初的编纂者和传播者？我们不可否认他们在传播屈原事迹和编注《楚辞》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这些问题，也须认真的对待、探索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源头，便只能是从宋玉的研究开始。宋玉的《九辩》，是今本《楚辞》所载唯一可信的作品，向被视为“悲秋”之祖。但若将《九辩》与《九章》进行对比研究，就会发现：《九辩》之悲秋，不仅是《九章》悲秋的余绪，而且在叙事上也与《九章》隐隐而合，简直就是《九章》的续篇。我所作之《宋玉〈九辩〉中的屈原形象》及《屈原的本事、原型及其流变》二文，便是在这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同时还附带论及了《离骚》、《九章》与《九辩》这三部作品的关系。这是 1990 年以前的情形。时间过了 10 多年到 2003 年，问题又回到对宋玉的研究，这时获得了新的考古资料，即江南澧水之南宋玉城遗址的调查资料，其城南山坡还有宋玉墓。这个发现使我明确了下列事实：(1)、依《九辩》所叙，屈原于 25 年遭楚王“弃逐”后，确曾返回陈郢欲面君自白，宋玉在那里接待并迎送了他；(2) 宋玉确曾于晚年自陈郢返回宋玉城定居并老死于此；(3) 宋玉定居江南期间直接从屈原获得《离骚》、《九章》，经过精心研究而作《九辩》；(4) 屈原死后，使宋玉成为编纂第一部屈、宋合集的唯一人选。因此《离骚序》的最早底本只能出于宋玉之手；(5)《离骚序》叙事详于怀王之世而略于顷襄，有意识的将《离骚》之作置于怀王疏屈原之后，自是为了避开考烈王朝政治上的迫害以利于屈辞的传播。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在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的研究基

基础上，作了《楚辞》成书探源系列的三篇论文，旨在提出一种思路，以供有兴趣的后来者。

写了上述五个问题的探索情形之后在问：25 年来我在楚辞研究领域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概括为八个字：研读、探索、感悟、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度过。研读是起步的基础，探索是开辟新的道路，感悟是心有所会，写作是留下的脚印。33 篇文章纪录着我走过的道路。生命不止，路还将走下去。33 篇论文，并非杰作，乃心血之凝聚。审校之时，除了改正错字，文字一悉照旧，以显其真。

写序之时，正值全国人民喜迎新春，甲申年之正月二十一日，恰为屈原诞辰 2347 周年，谨以《文集》的印出，奉献于这位伟大诗人之前。

冀凡 2004 年元月 16 日

屈原是效“彭咸水死”而自沉汨罗的吗？

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离开人世已经二千二百六十年了。二千多年来，他的诗歌被人们珍爱的诵读着、流传着；每逢他自沉殉难的日子——端午节，人们便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他，寄以哀思，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了。

但是，屈原为什么要自沉于汨罗？难道真如东汉王逸所说，是“效彭咸沉身于渊”^①吗？不，人们悼念屈原，是为他那崇高的爱国思想所感召。是怀念他那忠贞不渝地为国殉难的精神。人们并不知道彭咸。也从未传言屈原“效彭咸”而自沉，屈原之死与彭咸毫无关系。效“彭咸水死”而自沉的说法，完全是王逸从其封建文人的观点出发，歪曲屈原的思想，曲解屈原的作品而附会臆造出来的。意在贬低屈原的形象，使其成封建帝王所需要的忠臣士子。

王逸说法，绝不仅仅是涉及到某一作品注释的问题。二千多年来，由于王说的广泛流传，且又是第一个为屈原作品作注的人，在屈原研究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他的影响还浓重的存在，他的某些话还被奉为金科玉律。例如我们所尊敬的游国恩先生，数十年研究屈原和楚辞，成效也是卓著的，可说是当代的一位大师。然而由他主编于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其有关按语仍说：“屈子之效法彭咸而水死，二千年来无异辞。”^②至于其他注释屈辞的版本书籍，因袭王说之辞。则不必多举了。

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彭咸究系何人、彭咸是否“自投水死”、屈原之死与彭咸是否有关，屈原因何自沉汨罗等问题试作探讨，略述管见，以悼慰于诗人，以就教于学者。

彭咸究系何人？

我认为，屈原《离骚》、《抽思》、《悲回风》诸篇中之彭咸，即《天问》中之彭铿，也就是史籍中所载之彭祖，名钱铿者。此虽并非我之创见，但确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和真理。

据史籍所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屈原亦自称“帝高阳之苗裔”。颛顼之玄孙，祝融之后，陆终之子，其三曰彭祖。《史记》注云：“名翦、一名钱铿，彭姓，封于大彭，彭城是也。”因封于彭，故称彭祖、意为彭氏之祖。《楚世家》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陆终氏六子，其余均于夏衰或成汤伐桀时先后灭亡或迁徙，唯独彭祖一支绵延特长，至殷仍为侯伯，故被神仙家附会为长寿之祖。《神仙传》言其至“殷末七百六十九载而不衰老”，《搜神记》言其“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③

为什么说彭咸、彭铿实为一人呢？这是因古代读音相近而造成传写中的讹误。《说文》金部无“铿”字，疑为“𨮒”字之误。《说文》云：“𨮒，刚也。从金𨮒声，古甸切。”又：“𨮒，坚也。从又臣声，……读若铿锵之铿。古文以为贤字，苦闲切。”“咸，胡监切。”以是，𨮒、𨮒、铿、咸，古音相近 皆声之转也。明代汪瑗曾说：“史传以为‘铿’，而《离骚》以为‘咸’何也？瑗曰：铿与咸声相近而误也。……是古人语有缓急之殊，故读有平仄之异耳。……是咸也、铿也、翦也，其实一也。”④汪瑗的话是不错的，在先秦古籍中，雷祖之为嫫祖，丹朱之为矐兜、矐头等，可谓屡见不鲜。

为什么说屈辞之“彭咸”、“彭铿”，必为史籍之彭祖、钱铿？如前所述，唯其彭祖、钱铿为陆终氏子，颛顼之玄孙。是屈原及楚人之祖伯，所以屈原才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其作品中屡屡提到，其《抽思》中云：“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屈原将其称与五帝三王相比伦，学要以其为仪表，行要遵循其遗则，处要从其所居。倘非一人，哪里又有第二个‘彭咸’可当？其次，只有此祖，在“殷之

时尝为侯伯”，设非如此，哪里又生出第二个“殷贤大夫彭咸”而能受到屈原如此尊崇？

或曰：王逸所言必有其据。王逸是否有据我们固无从确知，但考之今之史籍，断无王逸之“彭咸”。且王逸所言之“自投水死”之“殷贤大夫”彭咸，又与屈原心之所想、文之所写的彭咸，如此有异，则又与屈原何干？又何能以王逸之“彭咸”套屈原之彭咸？

二

彭咸是否为“水死”？王逸认为是“自投水而死”的。他在所著之《楚辞章句》中说：“彭咸，殷贤大夫也，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

对于王逸“彭咸水死”之说，疑之最早的是宋代的朱熹，其《楚辞辩证》曰：“洪引颜师古以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与王逸异。然二说皆不知其所据也。”⑤朱氏之疑，实疑二说之是否有据。其后，明之汪瑗，清之陈远新、刘梦鹏、俞樾及近人曹耀湘等人，均提出种种质疑之辞，然终不见动摇其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⑥。

我之认为这是王逸的臆造之说，可从两方面去看。

其一，在先秦一切有关彭咸、彭铿、彭祖的记载中，均无可证“彭咸水死”的依据。司马迁作《史记》，考楚之世系，只言“殷之末世，灭彭祖氏”；作《屈原列传》，宁引渔父之言，只字未及彭咸以及“水死”的话。汉以后之神仙家，尽管把彭祖演化为神仙人物，也只是说他“流离西域，百有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亦无言及“水死”之语，可见即使在传说中也无“水死”的说法。

其二，可以证之以屈原作品本身。的确，彭咸是屈原所崇敬的人物，他的地位也不下于屈原所尊敬的尧、舜、禹、汤。但这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什么“殷贤大夫”或“谏其君不听，而自投水死”，而在于他是顓頊的后世子孙，楚人的祖伯。他的为人，在当时的传说中可能是个胸怀大志、刚正不阿、不从流俗，而遭遇与屈原有所相似的人物，这使屈原对他怀有更深一层的感情，故于作品

中屡屡提到。屈原在《离骚》中首先讲到彭咸的地方是：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很清楚，屈原在这里只是表明己之所行所为，是效法前代圣贤而行的，绝非世之俗人所作。虽然不能适合今世一些人的要求，但也要依照彭咸遗留下来范例办。唯其如此，紧接着他又一再地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明明讲的是要宁死不变其志，要不懈地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何曾有丝毫要“死”的意味！又何足证明“彭咸之遗则”即“自沉”的同义语！

再看《离骚》的乱辞。屈原在乱辞中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吾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关于乱辞所言“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云：“故我将自沉汨罗，从彭咸而居处也。”一见“彭咸”二字，便想到要“死”；一看到“从彭咸之所居”，便想到要“自沉汨罗”，真可谓联想“丰富”！然而，后世之一些研究者，往往追从王逸，人云亦云。而对屈子所言“故都”、“所居”，究有谁深解其所指所云？

统观《离骚》全文，除前一部份屈原直叙其忠而遭谗，反复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其决心外，其后之济沅湘就重华陈词、登昆仑之上下求索，涉流沙、渡赤水的西海之行，无一不为驰骋想象，追溯五帝三王之迹、法前修之志、缅楚之“旧乡”⑦、怀楚之“故都”，以展振兴楚国、统一中原之大愿。行昆仑、涉流沙，此楚之“旧乡”，颛顼所居；中原帝丘⑧，颛顼所都，乃楚之“故都”。缅“旧乡”、怀“故都”、及前王之踵武，这是屈原心怀大志纵情而发也，其意在冀怀王一悟，俗之一改。然哲王不寤，国无人知其宏愿大志，更无足以共为此美政之人，则宁从前修彭咸而处，亦不改其志之意，何有死志可言！倘非王逸所云，又何证“彭咸所居”必为水域！